

声视南方



——广东广播电视60年

毛锦钦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声视南方

——广东广播电视60年

毛锦钦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声视南方：广东广播电视 60 年 / 毛锦钦编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81135 - 349 - 5

I. 声… II. 毛… III. ①广播事业—概况—广东省 ②电视事业—概况—广东省 IV. G229.2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1261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暨南大学出版社排版设计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11

字 数：308 千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9 月第 1 次

定 价：2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 言

广东广播电视，是南中国崛起的一部恢弘的史册与传奇。

广东广播电视，是珠江水流动的一阕浑厚的诗词与歌咏。

光阴荏苒，旷世风华，广东广播电视从诞生至今已经走过了60年的辉煌历程。坚韧与乐观和谐的结合，演绎了广东广播电视多姿多彩的故事，时间与空间最佳的交织，催绽了广东广播电视的姹紫嫣红的业绩。

2007年1月1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了“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的新闻：

近年来，广东广播电视坚持改革创新，整合广电资源，创造了具有广东特色的广电体制改革“南方模式”。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06年广东广电的收视市场份额超过境外电视49个百分点，彻底改变了广东广电与境外媒体的竞争格局。三年前，全国第一个由省、市、县三级广电机构联合组成的全省性广电集团——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诞生，以省级台为龙头，以业务为纽带，在资金、节目、人才、技术、设备等方面支持市、县广播事业。广东电视台免费提供收视率高的节目给清远等地级市台播出，使地级市台自办频道的收视率得到提升。南方电视台与十五个市的电视台建立了稿件电子通联系统，加大了地级市台节目的信息量。同时集团着力推动中央和省级广播电视节目完整传输，扩大覆盖，目前广东省所有的地级市和76个县都能收到中央台和省台的电视节目。

广州市民称：过去我们打开电视都是看香港台，最近几年我们比较多地看境内的台，中央台、广东台、广州台……节目比较丰富多彩，更加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

大区域、多层次，140多个电视频道整合营销，还带来了省、市、县广告效益同步增长。2006年广东广电总收入超过90亿元，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这是一条由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发布的新闻，这新闻虽然不长，但分量极重，它不仅是对广东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历史性突破”的高度概括，更是对广东广播电视影响力的充分肯定。

看了这则新闻后，曾经是广东广电人的我，内心极不平静，因为这一天，是我调离广播电视局（台）到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工作的1周年纪念日。回首过去的岁月，心潮澎湃，我目睹和见证了广东广播电视事业的辉煌：一程风雨，一程云天，一程荆棘，一程鲜花，60年风雨兼程，60载岁月如歌。站在今天的历史坐标回望，广东广播电视让我魂牵梦绕，它的飞速发展又让我感慨与自豪。这“历史性的突破”，突破了我的思维空间，于是，撰写一本记录广东广播电视辉煌历程的书的想法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愿以微薄之力，表达我对广东广播电视事业的挚爱。

本书的特点之一在于，从改革、发展的角度概述了广东广播电视及广播电视人风雨同舟的历程。书中对广播电视的新闻宣传工作和娱乐文艺方面论述的篇幅比较大，对广播电视的事业建设、传播技术、体制改革、产业经营等各方面，也都作了比较全面的概述与分析。

思辨性比较强，也是本书的特点之一。全书共5章，前4章基本上是按“时序为经、大事为纬”的方法，介绍了广东广播电视6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反映了广东广播电视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在用事实说话的前提下，对广东广播电视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特别是对广播电视的改革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从微观到宏观、从时间到空间上，阐述精密，缕析清晰，观点鲜明，具有较强的时空关联性和历史逻辑性。

本书最后一章之“实践与启示”，是全书的“点睛”之处，其深刻的分析和高度的概括，有入木三分之感：其一，以事实

为依据，论述了“四级办”的功与过、是与非，以新的思维方式，分析了县级广播电视生存、发展的环境和地位与作用；其二，高度概括了“南方模式”的经验与特点，论证了“南方模式”是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新探索的一例典范；其三，深层次地分析了“珠江模式”的辉煌成就与卓越贡献，及其所产生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其四，以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历史为背景，以岭南文化的影响力和中西文化的碰撞为主要因素，诠释了广东广播电视在全国的影响力。

2009年，广东广播电视走过了60个春秋。这是广东广播电视繁荣发展的60年，也是一代代广东广电人不断探索，开拓创新，用智慧和心血创造辉煌的60年。拂去风尘，呈现鲜活，广东广电人以其意气风发，激情豪迈的形象伫立在中国的南方，让人回味无穷。60载奉献中的美丽，60载灿烂里的宁静，我带着满脸春风，带着朝圣般的向往，走进了广东广电那令人心旌摇荡的往昔，专心致志地记录了广东广播电视的历史，记录了广东广播电视的辉煌，这是一个心愿，也是一份责任。

毛锦钦

二〇〇九年九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曲折发展的广播电视	(1)
第一节 历史背景及重大决策	(1)
第二节 体制机构	(15)
第三节 初创时期(1949—1959)	(17)
第四节 发展时期(1959—1966)	(25)
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35)
第二章 恢复、起步的广东广播电视	(44)
第一节 历史背景及重大决策	(44)
第二节 广播电视微观改革	(50)
第三节 广播电视文艺节目	(58)
第四节 广播电视广告在起步	(62)
第五节 广播电视事业在改革中前进	(64)
第三章 改革、发展的广东广播电视	(71)
第一节 历史背景及重大决策	(71)
第二节 广播电视的宏观改革	(79)
第三节 广播电视文艺节目精彩纷呈	(107)
第四节 广播电视事业蒸蒸日上	(124)
第四章 飞速发展的广东广播电视	(149)
第一节 历史背景及重大决策	(149)
第二节 广播电视体制的深化改革	(157)

第三节	广播电视宣传改革	(166)
第四节	电视新闻宣传改革	(195)
第五节	广播电视文艺、娱乐节目	(224)
第六节	事业建设与经营创收	(254)

第五章 实践与启示 (267)

第一节	“四级办”的功过是非	(267)
第二节	“南方模式”的实践与启示	(277)
第三节	“珠江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301)
第四节	广东广电辉煌之原因	(325)

参考文献 (343)

后 记 (345)

第一章 曲折发展的广播电视

广东省的广播事业起步于 1949 年，电视事业起步于 1958 年。虽然广东的广播与电视发展起步时间不同，但正如许多的新生事物一样，广东的广播电视在它刚刚问世的时候，就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下不断艰苦前行。特别是从 1966 年到 1976 年的十年动乱期间，刚刚成长起来的广播电视事业遭到严重摧残，损失惨重。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广东省的广播电视事业还很弱小，加上受三年经济困难和国家压制经济规模的影响，特别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以及急躁冒进和“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在宣传中出现过严重的失误和偏差。这无疑使它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充满坎坷，但毕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第一节 历史背景及重大决策

一、历史背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3:00，北京 30 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54 门礼炮齐鸣 28 响。毛泽东又宣读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广东的广播事业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诞生。

（二）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到1952年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这一运动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深受压迫的中国农民获得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摆脱了千百年来封建宗法的人身束缚，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党依靠土地改革运动中形成的有觉悟有组织的阶级队伍，完成了对旧的乡村基层政权的改造，为中国社会逐渐走向进步，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伟大胜利。

土地改革运动推进了新民主主义改革的全面展开，在新民主主义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党和政府开展了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并取得了重大胜利，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党在过渡时期的总战线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到：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这条总路线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

^① 毛泽东。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见毛泽东文选（第六卷）（第1版）。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316

把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这条总路线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在全国人民中得到广泛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纲领。

（四）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大力向前推进。

1953年，党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的决议和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在这两个决议的指导下，全国80%以上的合作社都实现了增产增收，互助合作社运动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扩大了商品粮的需求量，出现了粮食供应不足、农民待价惜售和私人粮商粮贩操纵市场的局面。1953年10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决议。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初步缓解了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保持了市场物价稳定，农村掀起了大办农业社的热潮。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1953年6月，党中央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又决定对私营商业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这些政策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

1955年夏季到1956年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

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人民中逐渐树立起来。有了新的社会经济基础，又有依据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建设成果，这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真探索。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形势，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持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是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1957年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工作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正是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的结果。

（六）整风运动

1957年，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是符合党的“八大”精神的。整风运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知识分子和民主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和响应，但也为极少数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借机

发难提供了机会。为了迎击敌人的进攻，中共中央于6月8日作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此后，全国整风迅速转变为“反右”斗争，并一直持续到1958年夏天才结束。由于将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反右”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达55万人以上，误伤了一大批同志和朋友，使国家和党内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歪曲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论断，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错误的根源。

（七）“三面红旗”

“三面红旗”是中国共产党于1958年提出的一个施政口号，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其缺点是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不足，对中国经济情况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加上毛泽东等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的情绪，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运动和“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我国的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所发生的严重困难，党和人民遭受巨大牺牲和损失，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大批撕毁合同，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造成的。

（八）“八字方针”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对国家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个历史性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工作会议，即历史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是党的“八大”以后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克服经济困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以及为“反右倾”运动中部分被错误批评的同志平反，给划错的“右派分子”摘帽等经济和政治措施的实施，对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农业生产从1962年开始恢复，工业生产从1963年开始恢复，调整时期，国家还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业部门进行了充实，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趋于协调，市场供应情况显著好转，物价渐趋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文化教育和体育卫生有了新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九）文化大革命

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我国经历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全国陷入了“十年动乱”，在此期间，在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控制下，广东省的广播事业和全国的广电事业一样成为发动和推动“文革”的舆论工具，刚成长起来的电视事业遭到严重摧残，新闻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坏。尽管在此期间人们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斗争，但是从总体来看，“文革”对广东省的电视事业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革”开始。

“文革”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从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第一阶段。1966年5月，相继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两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文革”之初对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受到无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党的“九大”使“文革”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四人帮”在党中央的地位。

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第二个阶段。1970年至1971年1月，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企图杀害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1972年，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了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毛泽东却坚持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错误，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是第三阶段。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江青等人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借机进行篡权活动，毛泽东对他们作了严肃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1975年，周恩来身患重病，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毛泽东却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错误，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全党和全国人民无限悲痛。同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以及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活动。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革”这场历时十年的动乱。

二、重要会议及重大决策

1949年，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广播事业局，直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新闻总署领导。中央广播局的任务是：①领导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②直接领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国内和国外（呼号为“北京广播电台”）的广播；③普及人民广播事业；④指导和管理各地私营广播电台；⑤培养和训练广播事业干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领导和管理所在地方的广播事业和广播工业。^①

1950年2月27日，新闻总署召开京津新闻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相互关系和发展方向问题，还提出了“广播电台应以发布新闻、社会教育及文化娱乐为主，市台则应着重社会教育。人民广播电台对全国及对国际广播节目，应集中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地方人民广播电台除联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并应特别加强地方性节目”的广播电台发展方向。

（一）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1. 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1952年12月1日至11日，中央广播局在北京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广播电台台长和有关人员，共176人。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三年来广播事业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缺点，研究并确定了今后的发展方针和任务。会议提出了“重点建设，稳步前进”和“精办节目”的口号，会上，局长梅益作了题为“1953年广播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讲话，这是建国后首次举行的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会后，局长梅益向中共中央宣传部作了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宣部批准了他的报告，认为会议确定的方针、任务和办法是正确的，并电告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宣传部，要求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

^① 左漠野：《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4

2. 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中央广播局于1954年11月8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会议介绍了苏联广播工作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研究了过渡时期广播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具体任务。会议指出：在过渡时期，广播的基本任务是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的建设计划，鼓舞、教育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并逐步提高其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会议强调广播工作仍以改进和提高节目质量为主；要求认真学习苏联广播工作经验，加强群众工作和业务管理。

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后，在学习苏联广播工作经验的过程中曾得到苏联广播专家的指导，对推动我国广播工作者的业务学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减少甚至中断广播节目的批评性报道；二是削减了地方台的自办节目。

3. 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1955年12月15日至22日，中央广播局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发展我国广播事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年远景计划，修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计划，研究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的方针规划。

会后，《人民日报》于12月30日发表了题为“发展农村广播网”的社论，要求各级领导要充分关心和重视农村广播网的建设工作，要将其列入地方全面规划之中，加强对它的领导，并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农村广播网的方针是：坚持依靠群众，利用现有设备，分期发展，逐步正规，先村、社，后院、户。这次会议，对全国广播事业在过渡时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是初步制订了农村广播网发展的方针和方向；二是大体明确了全国广播事业近期和远景的发展规划。

4. 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中央广播事业局1956年7月25日至8月16日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全国广播工作总结经验、